

# 構建「文明轉換器」的三大支柱——從理念到平台

吳志良

澳門具備必要條件，系統性地構建其作為「文明轉換器」的三大功能支柱。

支柱一，是思想轉換——建立「全球文明語法研究所」，其目標要超越表面的文化介紹，深入解析不同文明體系的核心概念網絡與推理邏輯。

為此，可設立「概念考古學」研究項目，不滿足於「仁≈Benevolence」的簡單對應，而是組織中西學者團隊，共同追溯「仁」在儒家經典中的多重語境與演變脈絡，同時研究「Charity」在基督教神學與啟蒙運動中的概念史，為關鍵文明概念編製《深度對照詞典》，標註出每個概念不可通約的「硬核」與可能對話的「邊緣地帶」。

也可開發「文明邏輯模擬器」，與人工智能團隊合作，以澳門的歷史數據為訓練集，開發能模擬不同文明思維模式的對話系統：例如一個受過儒家經典訓練的中國士大夫與一個啟蒙運動背景的歐洲哲學家，就「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議題進行辯論。

還可發布《年度文明誤讀報告》，監測全球主流媒體、學術話語、社交媒體中，關於主要文明間（中—西、伊—西、印—中等）的系統性誤讀案例，分析其背後的概念扭曲機制，並提供基於澳門智慧的「概念澄清工具箱」。

支柱二，是實踐轉換——打造「世界共生方案孵化器」：將澳門歷史上的共生智慧，轉化為可應用於全球其他文明接觸區的具體政策工具、

社區方案與危機調解機制。通過創辦「衝突城市領導者研學計劃」，邀請耶路撒冷、尼科西亞（塞浦路斯）、莫斯塔爾（波黑）等存在深刻文明裂痕城市的社區領袖、規劃師、教育工作者，到澳門進行為期數月的深度浸入式學習。不是學習理論，而是跟隨澳門街坊會協調糾紛、參與不同宗教節慶的籌備、觀察學校如何處理多元文化課程，催生適合其當地的「微型和解項目」。

通過建立「文化遺產共生管理數據庫」，系統整理澳門在管理「媽閣廟—教堂」相鄰遺產、保護土生葡人非物質文化、運營多元文化節慶等方面的具體法規、財政方案、社區參與機制，並開源全球遺產城市開放，提供在線專家諮詢。

通過設立「全球文明接觸區治理獎」，獎勵全球範圍內在促進文明深度對話、化解文化衝突、創新共生治理方面做出傑出實踐的個人、社區或組織。將澳門打造為這一新興領域的全球榮譽中心。

支柱三，是人才轉換——培育「星橋一代」全球對話者：通過教育系統革新，在澳門當地培育，並向全球輸送新一代的「文明轉換器」。

要達至此一目標，首先，在中小學推行「根與翼」課程體系：「根」的部分，要求學生必須深入研學一門非自身家庭背景的文化傳統（如華人學生研學葡萄牙歷史文學，土生學生研學嶺南儒家經典），達到能夠理解其核心情感與道德邏輯的深度。「翼」的部分，則通過項目制學習，讓學生組隊解決真實的跨文化社

區議題，如「如何為遊客設計一條既能展現中西文化特色，又不流於表面刻板印象的文旅路線？」

其次，在澳門高校設立「跨文明對話與轉化」碩士學位：招收來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學生。核心課程不是文化比較，而是「轉化實驗室」，例如：「如何將非洲Ubuntu哲學中的共同體觀念，轉化為西方個人主義社會可理解的企業管理原則？」又如「如何將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態觀，轉譯為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具體政策倡議框架？」

第三，創建「澳門青年文明使者」全球網絡：資助完成上述教育的澳門青年，前往世界各地的文明接觸區、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從事實際的跨文化協調工作。讓他們成為從澳門這個「轉換器」輸出的、帶著共生密碼的「活性因子」。

一個卓越的轉換器，必須證明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澳門可以率先在以下三個全球性挑戰中，展示其獨特的「轉換價值」：

挑戰一，人工智能倫理的文明分歧：西方AI倫理強調個人隱私、算法透明；東方則更關注集體福祉、社會和諧。這導致全球AI治理規則難以制定。

轉換方案是，在澳門設立「全球AI倫理對話常設論壇」，邀請不同文明背景的哲學家、技術專家、政策制定者，共同工作。利用澳門的「中庸」實踐智慧，不追求大一統的全球標準，而是探索建立一種「差異化互認框架」——即不同文明體可以在核心原則（如禁止惡意使用）上達

成共識，同時在邊緣地帶（如數據收集範圍）允許基於文化邏輯的差異化實踐，並建立互認機制。

挑戰二，氣候變化應對的文化維度：西方應對方案側重技術減排與市場機制；許多原住民文化則強調與自然的靈性聯結與整體平衡。兩者對話不暢。

轉換方案是，以澳門為基地，發起「生態智慧共生項目」。將莫阿納長老式的原住民生態知識，與現代海洋科學結合，在澳門的海洋保護區進行協同治理實驗：建立一套「科學監測數據+傳統生態知識指標」的雙軌評估體系，為全球生態治理提供新的知識融合範式。

挑戰三：後疫情時代的社會信任重建：大流行疾病加劇了社會內部與文明之間的不信任，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的爭論被文明偏見所裹挾。

轉換方案是，系統研究澳門在歷史上應對霍亂等公共衛生危機時，

不同社群如何協作的記錄，提煉出一套「危機下的跨文化社區動員機制」，包括基於不同文化心理的溝通話術、共享資源的公平分配規則、儀式空間的適應性使用等，形成可輸出的《全球社區韌性建設手冊》。

從「實驗室」到「轉換器」，這不是簡單的比價升級，而是澳門角色的一次歷史性自覺，意味着澳門不再僅僅滿足於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個美好的「例外」，而要主動成為創造未來的「範例」。

這座小城的終極抱負，要證明人類文明的未來，不必然在「全球主義同質化」與「文明主義部落化」之間作二選一的抉擇，還有第三條道路：一條基於深度尊重、保持差異、主動轉化、協同創新的「文明共生之路」。這條道路需要「轉換器」——它精通不同文明的「語法」，善於將誤解轉化為理解的前奏，將衝突轉化為創新的契機。



澳門大橋。

新華社

## 導盲犬坦仔



暄暖人生 香寧

繁芷從加拿大回港過聖誕節。那天我們見面，她剛坐下，便脫口而出：「今日好唔開心！」印象中的她是個樂天派，很少會有不開心的事情，搞得我也很緊張，追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朋友登記成為了導盲犬幼犬的寄養家庭，曾經寄養過一隻名為坦仔的導盲犬，坦仔長大後訓練成熟，便投入了服務。那天坦仔在九龍城帶著失明的男主人過馬路。等待紅燈的時候，突然旁邊有一隻柴犬衝了過來，狠狠地咬了坦仔。可當時牠身後跟着失明的主人，牠不能亂跑，怕給主人帶來危險。於是只能忍痛吠了幾聲。而那隻柴犬的主人，只是拖走自己的狗，絲毫沒有理會被嚴重咬傷的坦仔，更不用說主動承擔賠償坦仔醫療費用。

可憐的坦仔被咬掉了一部分耳朵，血流下半邊臉。主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馬路對面的太太並非失明人士，她目睹了事發經過，但紅燈下，她無法追蹤咬坦仔的柴犬及其主人，她更擔心的是坦仔的安危。聽到此處，我已經極度憤怒。繁芷說，坦仔被咬成那樣，還忍痛帶著主人過了馬路。之後在太太的描述下，主人才知發生了何事。他們帶坦仔去檢查，發現耳朵被咬掉一塊肉，還有好幾個牙洞和抓痕，傷勢很嚴重，可能還需要做耳朵的部分切除手術。說到這裏繁芷已經哽咽。她在加拿大也養着一隻可愛的小狗，所以我明白她聽到這樣的事情一定非常痛心。我亦何嘗不是，想到坦仔忍受劇痛帶著主人過馬路，我的眼淚也幾乎要掉落。

幾天後心情才能平復。翻查報紙資料，這才了解到在香港，有視覺困難的人士逾十一萬，而在役的導盲犬的數量也不過六十隻左右。數量如此稀少，難怪我只在港鐵上見過一次，印象中那隻導盲犬很溫順，牠帶著主人進了車廂，主人在座位坐下後，牠安靜地趴在主

人的腳邊，因為體型較大，身邊的乘客也特意圍着牠站，盡量留出空間。那次覺得大家都很有愛，導盲犬也特別能幫到失明的人，讓他們可以盡可能像普通人一般出街。

要知道，培育一隻導盲犬一點也不容易，首先品種要選拉布拉多，當牠們大約四個月就會被送到寄養家庭進行社會化訓練，牠們需要經過各種各樣的考核，才能成為一隻合格的導盲犬，我們在路上看到的那些導盲犬，都經過了漫長的訓練，從尋找自動扶梯、港鐵站、八達通拍卡機等等，一遍又一遍。牠們原本也是寵物，雖然接受了那麼多嚴格的訓練，有極強的自主性和責任心，但工作之外，牠們和其他寵物狗一樣，也愛玩具和玩耍。只是因為承擔了導盲犬的工作，牠們少了很多普通寵物狗擁有的遊樂機會。

我也非常能體會繁芷朋友的痛心，因為寄養家庭對每隻導盲犬的感情都很深。這些幼犬從出生後兩個月就會安排生活在寄養家庭，一住便是一年一年半，牠們需要和人類親近，得到寄養家庭充分的關愛，才能在與家人的共同生活中，養成溫馴的性格以及習慣人類的環境。寄養家庭同時也肩負着培育和訓練牠們基本行為的任務，有着如此的愛心和耐心，真的太令人敬佩了。真希望有更多的家庭能夠成為導盲犬的寄養家庭，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獲得導盲犬的幫助。

相比之下，對自己的狗毫無管束，任其肆意咬傷其他動物，這樣的主人實在令人感到憤慨。他們應該接受應有的譴責和責罰。真誠地希望每個寵物的主人，都能以對社會負責的心態，養好自己的寵物，不要說什麼牠們平日很乖，不咬人，如果性格頑皮，或者缺乏訓練，很難保證不出事故。建議主人們不妨從出街給狗戴好口罩，及時清理糞便等基本禮儀做起，避免這樣的慘劇再次發生，也讓城市保持應有的清潔。



市井萬象

## 冰雪之樂

近日，四川省迎來新一年冰雪季。自然生態景區變身冰雪世界，全省十九個雪場也成為冰雪愛好者們的天堂。圖為中外遊客在四川省理縣畢棚溝滑雪場遊玩。 新華社



## 湘雅紅樓：西方來到東方



流動空間 方元

湖南長沙是一座有千年歷史的名城，但它看上去很年輕。這是我第一次去長沙旅遊，去前準備了一張清單，列出要參觀的建築。到長沙後的第一天，我便跑去清單上名列第一的建築——湘雅醫院的紅樓。

在長沙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湘雅醫院是一條新加入的、來自西方的水系。一九一四年，湖南省政府邀請美國雅禮協會合辦醫院和醫科學校。湘雅紅樓即是當年西方來到東方、西醫初到中國的見證。

作為湖南最早的西醫醫院，湘雅醫院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享有重要的一席。那麼，紅樓在中國建築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嗎？我認為，紅樓作為湖南最早的現代醫院建築，僅此一點就足以使它名留史冊。雖然早就聽聞湘雅醫院的大名，但對於紅樓的存在，我一直半信半疑。一九九九年內地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建築》彙編了過去一百年全國各地建成的主要建築，總數有近千座，然而，在長沙的建築中沒有收錄湘雅醫院。是不是紅樓的原建築已不存在了？

湘雅紅樓建於一九一七年，由美國建築師茂飛（H. K. Murphy）設計。一九四二年，湘雅醫院被侵華日軍燒毀。抗日戰爭勝利後，湘雅醫院在原址的殘垣斷壁上進行了重建和擴建。二〇一一年，紅樓被湖南省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隨後進行了大規模的翻修工程，直到二〇一九年才重新向公眾開放。在經歷了這麼多變化之後，它現在是什麼模樣？

這次長沙之行讓我撥開多年的疑雲，見到「廬山」真面目。今日人們所見的紅樓，基本由三個部分組成：一九一七年遺留的主樓牆身，一九四七年重建的主樓屋頂，以及一九五一年之後擴建的多座配樓。把現今的紅樓與歷史照片比較時，我們可看到它在不斷地「成長」，例如，屋頂加大了，改變了形式；配樓增高了，增多了；三樓的簷口消失了，代之為白色帶形裝飾等。儘管有多處改動，但建築在整體上維持了原有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

屋頂是建築的重要特徵。誰是紅樓新屋頂的設計者？茂飛在一九三五年已返回美國，因此負責紅樓戰後重建和改建的建築師另有其人。值得注意的是，主樓的屋頂在重建時並沒有按茂飛的設計復原，而是比原來的屋頂更華麗、更複雜。從新屋頂的設計上看，我推測這位建築師具有很好的中西文化功底。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他是誰。在歷史的星空上，他的名字被茂飛的光芒掩蓋了。

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即是中西混合的大屋頂建築。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種建築風格的發明者和早期的實踐者不是中國建築師，而是西方建築師。在中國第一代現代建築師走出校門之前，西方建築師已在設計中式大屋頂建築。茂飛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的，但他是最出名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

如果當年梁思成看到湘雅紅樓，他會怎麼評價？我想，梁先生會持批評的立場。作為中國古典建築專家，他一眼就能看出茂飛設計的中式大屋頂是幼稚的。不過，我要為茂飛辯解幾句。當茂飛在一九一四年着手設計湘雅紅樓時，他能看到的關於中國古典建築的設計資料非常有限。那年，未來的建築學家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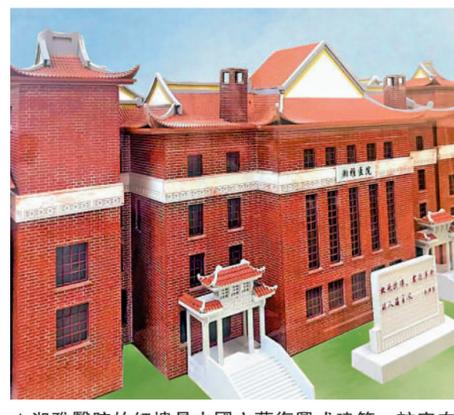
思成尚未邁入清華學校的校門。當茂飛設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今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時，梁思成尚未去美國學習建築。當梁思成經過多年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在一九三五年開始陸續出版《建築設計參考圖集》時，茂飛已離開中國。湘雅紅樓表現了西方現代建築與東方傳統建築如何相遇，又如何相處。它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在義和團運動之後，西方意識到，用炮艦與東方打交道，只會激起越來越大的敵意和反抗。於是，一些西方教團提倡通過辦學、行醫等柔性方式，吸引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教育和科學，從而扭轉他們對西方的負面看法。

西方教團在改變策略的同時，在形象上也做出相應的配合。為了減少中國人的抗拒心理，增加文化親近感，教團要求建築師採用傳統的中國建築形式。因此，在二十世紀初至二十年代，西方教會開辦的學校和醫院大部分都採用中西混合的建築形式。

湘雅醫院的第一任院長胡美（E. H. Hume）和湘雅紅樓的建築師茂飛，即是在這個時期先後來到中國，相會在長沙。他們不是士兵，不是傳教士，而是醫生和工程師，因此比較容易被當地人民接受。在傳授西方現代知識的同時，他們也向當地人學習中國的傳統知識。胡美考察了中醫中藥，茂飛研習了明清建築。借用胡美的話說，他們是「在國家與國家、文化與文化之間架設橋樑的人」。

湘雅紅樓是茂飛設計的第一座中國風格的建築。將它與茂飛以後的作品比較，我們可看出，隨着他對中國古典建築逐漸加深認識，他的建築風格愈加中國化。當時，西方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古典建築是落後的、過時的，無法與時並進。茂飛經過自己的實踐提出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古典建築像西方古典建築一樣，具有適應現代建築和現代技術的能力。茂飛的觀點鼓勵和啟發了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師。

如今，湘雅醫院在紅樓裏開了一個展覽館，讓人們通過重溫醫院的百年歷史，反思東西方的相處之道。在展廳的入口可看到胡美的浮雕像——長沙人民沒有忘記他。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後，胡美返回美國，他給後人的忠告是：「只有通過友好的途徑來到中國城堡的人，那裏的人民才會為他敞開城門。」



▲湘雅醫院的紅樓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訪客在展廳可看到它的全景模型。 作者供圖